

but still have it. Well, I think he
will, like you, appreciate his inheritance.

There were, however, some other, more
obvious, problems in the case than the
inheritance.

— — — — —

There was, for example, the matter of the
large sum of money which had been deposited
in the bank in the name of the deceased.

It was thought at first that it was
the inheritance of the deceased, but it
was soon discovered that it was not.

— — — — —

There was, for example, the matter of the
large sum of money which had been deposited
in the bank in the name of the deceased.
This was the inheritance of the deceased.
There was also the matter of the
large sum of money which had been deposited
in the bank in the name of the deceased.
This was the inheritance of the deceased.
There was also the matter of the
large sum of money which had been deposited
in the bank in the name of the deceased.
This was the inheritance of the deceased.

There was also the matter of the
large sum of money which had been deposited
in the bank in the name of the deceased.

卷首语

在中国历史上,对孙子及《孙子兵法》的评论是与中国文化思想史、学术史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的,这主要是因为《孙子兵法》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任何传统文化和思想要素的发展、变化及重新组合都无法回避为孙子兵学定位的问题。据此,可以将历代有关《孙子兵法》的评论分为五个时期:一是先秦诸子时期;二是秦汉至隋唐时期;三是宋元明清时期;四是近代至民国时期;五是新中国时期。

先秦时期,长期连绵不断的战争和学术思想上百家争鸣的时代背景为兵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兵家开始作为一个学派兴起,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兵学理论。从荀子、韩非等儒家、法家人物对孙子的评论中,可知孙子在当时已是兵家的代表人物,具有崇高的声望。从中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与兵家的分歧早在先秦时期即已显现出来了。

秦汉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建立,使得文治逐渐取代武功而成为统治者治国安邦的主要手段,这样的历史际遇也注定了孙子兵学势必要结束先秦时期的辉煌。及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与儒学先天异质的《孙子兵法》也就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批判。西汉末年儒家学者刘歆把孔道之折归因于兵家之兴:“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重遭战国,弃笾豆之礼,理军旅之陈,孔氏之道抑,而孙、吴之术兴。”(《汉书·楚元王传》)东汉历史学家班固则认为孙子之术是“季世不祥,背本争末”的产物。这些论述直接将孙子兵学定位在了儒学的对立面上,是正统儒学对《孙子兵法》的典型评价。随着儒学统治地位的日益坚固,这种对《孙子兵法》的道德评判也就成为世人评论《孙子兵法》的基调。尽管如此,《孙子兵法》仍是行军作战不可或缺的参考。《汉书·叙传》,在受到正统儒学贬抑和排挤的同时,《孙子兵法》依然在军事领域有着巨大的影响。三国

时期的曹操、诸葛亮，唐朝的唐太宗、李靖等人都是服膺《孙子兵法》而有所成就的战略家。

宋代开始了孙子兵学发展的新时期。宋神宗元丰年间，诏令将《孙子》等七部兵书确定为武经，作为武学教学和武科取士的基本教材。从此，《孙子兵法》具有了官学经典的身份，地位有了显著提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儒学与兵学冲突的缓解。由于理学的兴起，一些人对《孙子兵法》的“兵以诈立”、“兵者，诡道”等观点提出了更为激烈的批评。北宋著名学者陈师道就说，“孙吴之书，盗术也，不足陈于王者之前”（《后山集·拟御试武举策》）。直到南宋末年的叶适还力陈“孙武之不可用”（《水心别集·兵权上》）。对孙子兵学这种思想上和政治上评价的不一致性，体现在许多时人的议论中。梅尧臣就一方面以《孙子兵法》为“战国相倾之说”；另一方面又“爱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师用兵，料敌制胜，亦皆有法”（《欧阳文忠公集·居士集·孙子后序》），为它作注，成为著名的“十一家注”之一。综观宋代至清代有关《孙子兵法》的评论，有如下四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是《孙子兵法》作为兵学圣典的地位已经确然不拔。无论持论的褒与贬，人们都公认《孙子兵法》是兵学领域最杰出的著作。二是一方面肯定《孙子兵法》论兵精当，有克敌制胜之用，另一方面却认为《孙子兵法》“以将用之则可，以君用之则不可”（苏轼《应诏集·孙武论下》），不能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之计——在统治国家的根本问题上要依靠儒家思想，孙子兵学只能作为实用层面上的治国工具来对待。这种观点越来越成为文人论兵的主流，实际上也反映着封建统治框架内儒学与兵学关系的真实状况。三是《孙子兵法》的文学价值受到广泛赞誉。苏洵、陈师道等相当一批学者都对《孙子兵法》的文辞备加推崇。四是疑伪论兴起。先是叶适认为《孙子兵法》为“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习学记言序目·孙子》），对《史记》所载孙子其人予以否定，继之陈振孙在所著《直斋书录解题》中称孙子“未知果何代人也”，对孙子其人及《孙子兵法》的成书年代都提出了怀疑。他们的说法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孙子兵法》的真伪成为学者聚讼纷纭的问题。

从中国古代有关《孙子兵法》的评论可以看出，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孙子兵法》一直处于为主流意识形态所排挤的状态，但它依然凭借在军事上无法取代的实用性及谋略思想在诸多领域的普遍性而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园地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这也就产生了另

一个关于《孙子兵法》评论的突出的现象，即文人学者讥评之论较多，参与军事实践的人或务实的政治家则褒奖较多。

近代是《孙子兵法》研究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也是孙子评论的一个新阶段。这一时期有关孙子和《孙子兵法》的评论开始摆脱以儒学相裁夺的既定模式，着力于将《孙子兵法》的思想与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时代相联系，阐发其战略思想上的价值及其在反侵略战争中的现实指导意义。以蒋方震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开始运用现代军事理论对《孙子兵法》进行重新解析，逐渐建立起了《孙子兵法》研究的新体系。与西方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等的比较也成为这一时期评价《孙子兵法》的一个重要视角。在比较中更加凸显出《孙子兵法》及东方兵学文化的特质。更有人以世界战争史与孙子思想相印证，认为中外战略战术“其理无出孙子之外者”（苏荫森《苏氏孙子注解·孙子附说》），称孙子为“世界兵圣”（萧天石《孙子战争论》）。总之，这一阶段对孙子的评论反映出《孙子兵法》研究已经完成了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上的转变，开始呈现出新的面貌。

毛泽东、刘伯承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孙子兵法》的创造性研究与运用更为《孙子兵法》研究写下了新的篇章。早在革命战争时期，郭化若将军就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孙子兵法》，对《孙子兵法》作了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精辟分析和论断。以之为起点，新中国的《孙子兵法》研究和评论蓬勃发展起来。内容涉及军事思想、政治谋略、企业管理、体育竞技、文化意蕴等诸多方面，具有空前的广度和深度。

在外国人对《孙子兵法》的评论中，以日本人的评论最为全面和深入。他们的《孙子兵法》研究与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大。但是，与中国学者的议论相比，日本的评论少了一些儒学的陈腐之气，更侧重于对《孙子兵法》内在逻辑关系的解析与学理的推求阐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民族学术文化的特点。其他国家的一些学者对《孙子兵法》的评论也为《孙子兵法》研究提供了各自不同的视点。

本卷共收录古今中外 293 人（未含两人合论者）对孙子和《孙子兵法》的评论，分为国内与国外两部分，各部分均依评论者年代排序。所收评论，均标明出处；出处不详或无确切文献记载者，不予收录，如盛传

的有关拿破仑和德皇威廉二世读《孙子》的文字,因无法核实,只好忍痛割爱。为阅读方便,所收评论除自然段内省略之文,采用省略号外,句子前后均不标注。对于评论中文字差错,除明显错误纠正外,余一仍其旧,不擅改动。限于资料,有的评论者简历,或暂作阙如,或难尽准确,谨此说明,并致歉意。以个人有限的学力和精力,要在浩如烟海的《孙子兵法》研究资料中遍集相关评语,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此,本卷所选只是资料所及的部分人物的评论。即或如此,恐怕也难免有所漏略,尤其是外国学者的评论更是难称完备。疏忽不足之处还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本卷由我和苏桂亮先生共同完成,他补充了约百余条目,并对全卷进行统稿。在纂辑过程中参考了吴如嵩主编的《孙子兵法辞典》中的相关内容,引用古棣主编的《孙子兵法大辞典》中的几个条目,以及大量《孙子兵法》著作和报刊资料,难以备列,在此谨致谢忱!

魏 鸿

2001年8月于军事科学院

目 录

上编 国内部分

卷首语	1
白 圭	1
尉 缥	1
荀 子	1
韩非子	2
吕不韦	2
司马迁	3
刘 煬	3
王 充	4
班 固	4
王 符	5
曹 操	5
诸葛亮	5
傅 玄	6
刘 韶	6
李 靖	6
李世民	7
杜 佑	7
杜 牧	7
刘 昗	8
许 洞	8
梅尧臣	8
欧阳修	9

苏 淳	9
王安石	9
苏 轼	10
陈师道	10
何去非	10
张 预	11
吕本中	11
胡 宏	12
施子美	12
郑 厚	12
张 柝	12
郑友贤	13
陈傅良	13
戴 溪	13
叶 适	14
李耆卿	15
陈振孙	15
黄 震	16
戴表元	16
潘可大	16
宋 濂	17
朱元璋	17
刘 寅	18
方孝孺	18
郑 灵	19
沐 僖	19
胡 端	19
李 清	19
汤 锐	20
赵本学	20
俞大猷	21
谈 怡	21

张居正	21
王世贞	22
戚继光	23
胡应麟	24
李 贽	24
郭惟贤	24
梅国桢	25
闵振声	25
谢弘仪	25
程 涓	26
黄邦彦	26
周光镐	27
陈仁锡	27
茅元仪	27
傅锦泉等	28
西湖遗士	28
钱 福	28
洪承畴	29
唐 甄	29
邓廷罗	29
陈廷敬	30
丁洪章	30
杨 谦	30
朱 塘	31
顾祖禹	31
郑 端	31
汪允礼	31
汪 绚	32
徐大椿	33
姚 鼎	33
永瑢、纪昀	33
孙星衍	34

毕以珣	34
王昆绳	35
张九镡	35
张象津	35
徐 经	35
魏 源	36
方濬颐	36
于 鹜	37
朱煌漫	37
梁肇煌	37
恽祖翼	38
陈任旸	38
沈宗祉	38
顾福棠	38
黄 巍	38
陈荣昌	39
陆懋德	39
徐世昌	40
孙中山	40
梁启超	41
夏寿田	41
蒋方震、刘邦骥	42
景耀月	43
钱基博	44
蒋介石	45
何 健	46
关 靖	46
杨 杰	47
温晋城	48
顾祝同	48
陈启天	48
陈光中	50

方 策	50
萧天石	51
罗 列	52
李浴日	53
吴鹤云	54
谭彼岸	54
陈南平	55
彭铁云	56
林 夏	56
苏荫森	56
王明长	58
陈和祥	58
赵玉珊	59
齐 廉	59
韩一青	59
邱祖铭	60
陆修祐	60
徐庆誉	60
周传铭	61
陈清泉	62
澹 云	62
杨言昌	62
陆达节	62
刘文星	63
支伟成	63
张廷灏	63
叶夷中	65
金典戎	65
许有成	66
余毅恒	66
徐容溥	67
杨家骆	67

毛泽东	67
郭沫若	68
刘伯承	69
范文澜	70
张文穆	71
冯友兰	71
徐向前	72
薄一波	72
郭化若	73
朱军	75
张岱年	76
耿飚	76
庞齐	77
季羡林	77
洪学智	78
任继愈	79
刘华清	81
穆志超	81
杨丙安	82
李鹏	83
迟浩田	83
姜春云	84
郭鸿翔	85
李瑞环	85

下编 国外部分

北条氏长	87
山鹿高祐	87
琼山丘濬	88
葛业资	89
长沼澹斋	89
永沼丹生	89

新井君美	89
荻生徂徕	90
源信卿	90
松宫观山	90
德田邕兴	90
神田胜久	91
吉田松阴	91
恩田仰岳	92
豫堂源謨	93
佐久间象山	93
落合丰三郎	93
平山潛	94
加藤道	95
武藤章	95
坂井未雄	95
尾川敬二	95
新田兴	96
北村佳逸	96
福本义亮	96
若山拯	96
长山贯	97
秋山真之	97
大场弥平	97
松下幸之助	98
海音寺潮五郎	99
丰增秀俊	99
大桥武夫	100
会田雄次	101
冈本隆三	101
中曾根康弘	102
阿竹仙之助	102
浅野祐吾	103

河野收	103
金谷治	104
守屋洋	104
服部千春	104
上山保彦	106
平山郁夫	106
宇都宫德马	107
赖山阳	107
佐藤坚司	107
藤塚邻、森西洲	108
平山晋策	109
阿多俊介	110
上原勇	111
今村均	111
安积信	111
樱铁郎	111
平间洋一	112
板川正吾	112
三好修	113
河野守宏	114
大前研一	114
小山内宏	115
郑飞石	116
金岩山	116
孙正义	116
郑良树	118
吕罗拔	118
萨尔卡尔	120
杜勒斯	121
格里菲思	121
里根	123
尼克松	123

布热津斯基	124
维 西	125
凯 利	125
劳伦斯	125
柯林斯	126
腊斯克	127
阿特伍德	127
斯图尔特、陶	127
松得尔恩	128
莱 克	129
波拉克	129
牛铭实、欧德修克	129
弗里曼	130
斯坦因	130
史密斯	130
小乔治	131
哈伍德	131
格 林	132
里克特、达尔伯格	132
麦克拉伦	132
白恩时	133
阿 利	133
白邦瑞	134
江忆恩	135
罗伯茨	136
蒙哥马利	136
利德尔·哈特	136
斯莱塞	138
克拉维尔	138
菲利普斯	139
布 劳	139
肯尼迪	140

迪 肯	140
斯列兹涅夫斯基	140
郭泰纳夫	140
拉 津	140
西多连科	141
斯洛博琴科	141
胡 思	141
基尔申	141
乔甘塔斯	142
吉尔瑞茨	143
阿米奥	143
拉科斯特	143
龙乐恒	143
鲍尔多罗佐	144
高利科夫斯基	144
高利纳利	145
安蒂普	146
施塔尔	146

上 编

国内部分

白圭论孙子 白圭，战国初周人。著名商人。善于利用时机，“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他的经商理论颇有与孙子用兵暗合之处。

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史记·货殖列传》

尉缭论孙子 尉缭，战国梁惠王时人。《尉缭子》一书作者。该书较完备地记述了中国早期的战斗、内务、纪律方面的律令，是研究先秦军事制度的重要史料，继承并发展《孙子》等兵书的思想。

有提十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桓公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

——《尉缭子·制谈第三》

荀子论孙子 荀子（约前313—前238），战国末期赵国人，思想家、教育家。名况，时人尊称荀卿，汉朝人避宣帝讳，称孙卿。是战国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儒家崇礼的基础上，他吸收了法家思想，主张“性恶论”，提出“法后王”。同时他又是先秦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提出了著名的“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观点。晚年游学于齐、楚等国，齐襄王时在稷下学宫讲学，三为祭酒（学长）。约于楚考烈王八年（前255）被楚春申君任命为兰陵令（今山东苍山县兰陵镇），春申君去世后，退隐兰陵，著述授徒以终。其主要言论集中在《荀子》一书中。

王（赵孝成王）曰：“请问兵要。”临武君对曰：“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动。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术也。”孙卿子曰：“不然，臣

所闻古之道，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调，则羿不能以中微。六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临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贵者，势利也，所行者，变诈也。善用兵者，惑乎悠暗，莫知其所从出。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岂必待附民哉？”孙卿子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贵，权谋势力也，所行，攻夺变诈也，诸侯之势也。仁人之兵，不可诈也。”

——《荀子·议兵篇》

世方争于功利，而驰说者以孙、吴为宗。时唯孙卿明于王道，而非之曰：“彼孙、吴者，上势力而责变诈，施于暴乱昏嫚之国，君臣有间，上下离心，政谋不良，故可变而诈也。夫仁人在上，为下所仰，犹子弟之卫父兄，若手足之捍头目，何可当也？”

——《汉书·刑法志》

韩非子论孙子 韩非子(前280—前233)，战国末期韩国人。法家主要代表人物。出身于韩国贵族家庭，与李斯同为荀子高徒。他曾数次上书韩王安修明法度，均未被采纳，于是发愤著书立说，写成《孤愤》、《五蠹》等十余万言，秦王嬴政读后非常赏识。秦攻韩，韩国派韩非使秦，得见秦王。李斯时为秦相，因嫉妒其才华而进谗言，他被陷害入狱，自杀于狱中。他的学说兼采商鞅、申不害、慎到之说，提出了法、术、势三者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主张中央集权、君主专制、重耕战、轻商学，倡言武力统一。他发展了荀子的唯物主义思想，否定天命鬼神，反对卜筮迷信。他还反对墨守成规，认为社会处于不断进化之中，应随时代变化而变法。他的著述被后人辑成《韩非子》一书。

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

——《韩非子·五蠹篇》

吕不韦论孙子 吕不韦(?—前235)，战国末年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原为阳翟(今河南禹县)大商人。后在赵都结识秦公子异人(后改名子楚)，游说华阳夫人，立为太子。子楚继位，他被任为相国。秦王政年幼继位，继任相国，尊为仲父。执政时攻取周、赵、魏的土地，建立三川、太原、东郡。门下有宾客三千，家僮万人。曾令宾客编著